

本期话题：“高考工厂”

中国课程
CHINA COURSE

2014•第一期

扫一扫，更多资讯和互动



中国新课程研究院编辑

本期目录

课改动态/2

国际资讯/3

本期话题：“高考工厂” /5

刘坚：中国社会必须对“高考工厂”说“不”

特别推荐/10

吴康宁：政府部门超强控制：制约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一个要害性问题

读书/22

课改动态

◆全国人大检查组：素质教育面临“三重三不重”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许多学校教育还存在着“重知识不重能力、重智育不重体育、重课堂不重课外”的现象。报告认为，各级政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实施素质教育，但中高考升学压力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依然发挥着影响。由于场地、设备缺乏和师资短缺等原因，一些学校难以开齐开足课程；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休息和锻炼时间严重不足；青少年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报告强调，这些问题如不切实解决，将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乃至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教育部：基础教育领域将在七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在面向全国基础教育系统的网络公开课上，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指出，基础教育领域将在以下7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一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改革，二是基

基础教育考试招生改革,三是基础教育治理结构改革,四是基础教育育人模式改革,五是基础教育教学过程改革,六是基础教育教师管理改革,七是基础教育督导监测改革。同时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事业发展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的关系、勇于探索与维护稳定的关系。

◆30个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确定

教育部办公厅于12月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确定上海市、浙江省、北京市东城区、石家庄市、等全国30个地区为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通知》强调,各实验区要在申报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订实施工作方案,明确实验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突出系统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实验区要在认真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细化指标考查要点、评价标准和依据,开发评价工具,在区域内开展评价,进一步修改完善。

◆调查显示:改进师生关系,教师需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在杭州、大连和成都等地的调查显示,从影响师生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来看,32.8%的学生认为是“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授课方式”;28.3%的学生认为是“教师的管理能力和方式”;15.1%的学生认为是“教师的个人魅力”;14.8%的学生认为是“学生的个人素质”;仅有3.4%的学生认为是“家长对老师和学生的看法”。由此可见,改进师生关系,首先需要提交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国际资讯

◆法国教育改革再出重拳 强调数字化服务能力

法国政府近期正式公布了《共和国学校重建导向与规划法》。新法旨在建立公正的、严格要求的、富有包容精神的学校，教师在新的德育和公民教育的框架下，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贯彻共和国的价值观，教会学生生活所需要的重要能力。

新法特别提出了数字教育服务的概念，让教师、学生和家長能够轻松地在网络上找到自己需要的教育资源和软件，学生从而可以真正地学习掌握多媒体，具备未来公民必备的这一能力，同时促进学校教育走进数字化时代。

根据新法，法国总统明确了在将青年与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头等大事中所要担负的责任，为评价各级各类学生水平以及减少教育不公平现象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再次明确了在教育领域创造 6 万个就业岗位的计划。

◆澳大利亚超 1/4 新教师遭受情绪困扰感到职业倦怠

据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报道，莫纳什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超过 1/4 的新教师在刚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时，遭受到情绪衰竭和倦怠感的困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缺乏行政支持、繁杂的规定，以及不得不面对比他们预想更为严重的情绪问题。接受调查的很多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情绪，如讽刺学生、暴力倾向、消极应对错误等。那些热爱教师岗位，甚至终身投入教师行业的人在刚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时，所遭受的倦怠感和不满感反而是最强烈的。

◆英国研究显示适当运动能提高青少年学习成绩

据英国广播公司官方网站报道，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该研究对约 5000 名儿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男孩每增加 17 分钟的锻炼，女孩每增加 12 分钟的锻炼，他们的学习成绩将可能获得进步，

体育活动尤其有益于女生对科学的学习。

研究表明，儿童进行有规律的锻炼，将不仅有利于他们 11 岁时的学习，还有助于他们在 13 岁和 16 岁的考试中取得成功。专业人士建议，青少年一天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应不低于一小时，而调查时发现，大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运动时间远不达标。研究者表示，由于每 15 分钟的锻炼能使学生的成绩进步约 1/4 个等级，因此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的儿童很可能进步一个等级。

◆研究显示教师对后进生进步帮助更大

近期，澳大利亚一项针对 4 万名公立学校和天主教学校学生所做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已经在阅读和数学课程上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学生来说，教师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和提升作用。排名后 25% 的学生取得的成绩进步是最明显的，是预想的 5 倍之多。教师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从而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理解水平来准备课程。

本期话题：“高考工厂”

新闻回放：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徽省毛坦厂中学只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山区学校。如今的毛中，演绎着一个“逆袭”的故事。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锻造”。这里有严苛的时间作息制度。一天 24 小时会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通常，



早上6点10分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分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两小时，但学生被要求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有的班主任甚至还要求“统一上厕所”，“以免进进出出影响别人休息”。对于老师们来说，这座“工厂”的生存法则非常残酷。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学期根据考试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而班主任可以炒掉任课教师。

——陈璇：《寓言镇上的神话中学》，《中国青年报》2013年9月18日

衡水中学完全可以被当做一家工厂来看待。流水线从每天清晨5:30开始运作，到每晚上22:10关机停工，其间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管理。拿着衡水中学的作息时间表，你看不到哪怕一



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教师们仿佛是往电路板上焊接元件的女工——喜欢招聘女老师是衡水中学的一个传统，因为“好管理”——她们在规定的时点上，娴熟地把语文、英语、数学等科目考试所需要的知识，焊接到这些十六七岁孩子的大脑里。这个工厂的产品，便是每年6月份的高考升学率。而整个河北省的初中，则都是衡水中学的原材料供应商。在这所超级中学的“英才街”上，可以看到教育的理念和荣耀被层层削减后剩下的东西：考试，考更好高校以及最好的高校。

——雷磊、藏瑾：《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南方周末》2013年10月10日

观点：



中国社会必须对“高考工厂”说“不”

刘坚

今天我国不少高中已经沦为“高考工厂”，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媒体关于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的相关报道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说起来，“高考工厂”早在上个世纪即已存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半军事化管理、强化习题训练、以“死揪”的方式提高学生高考成绩和县中模式崛起，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素质教育的大撤退，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同的是，今天有的高考工厂规模变得更大，它们跨越区域之隔，在更广的范围内吸取资源；管理更加精细严苛，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方面面都提出细化要求，目标直指考试成绩；当然，它们造成的危害无疑也更大。

高考工厂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当前社会用人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就业高度竞争，导致社会上普遍存在焦灼的情绪，大家都试图在社会的竞争中赢得更好的位置。而高考工厂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这种期待。所以，毫不意外，这些高考工厂尽管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完全背离了学生成长规律，但却得到不少的拥趸。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毫不羞愧地将这种办学行为褒扬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让高中生变得卓越”。

不过，迎合毕竟是与引领背道而驰的，迎合更意味着方向的迷失和倒退。从根本上说，高考工厂里的“教育”，已不再是教育。它们违背了教育的基本属性，

违反了人性。除了服务社会的功能，教育更为重要、且长期为我们忽视的功能是为每一个个体完满的人性的生长创造机会，让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最好的自己。试问：当校园生活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终极目的，当学生三年的高中生活被压缩成一张张试卷、一个个分数，学生的人性又如何生长？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教育不仅要为当下的社会服务，更要为未来的社会奠基；不仅要为学生的当下负责，更要为学生的未来着想。当下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人为本正在成为当下中国人的根本诉求，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改变，创造力、沟通协调能力、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学习能力对于人的一生更为重要。

教育绝对不应该变成“非教育”（训练），更不能成为反教育；否则，尽管教育工作者付出了无比的辛劳，却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甚至有一天被抛弃，而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幸福感、个人的专业发展也会在这种枯燥机械的校园生活中丧失。

人，是要有尊严的。今天，我们的校长、教师要想在这个社会真正立足、令人尊敬，要想获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尊严，就必须不断追问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遵循人的成长成才规律，审慎地选择教育的路径和方法，尽其所能还学生应有的欢乐童年，还青少年自由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自从选择了教育这个岗位，就应该确立的职业底线；这，也是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对于高考工厂，一切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都要保持警醒的态度，保持抵制的姿态，因为它们绝不代表中国教育的方向，代表中国教育的未来，其生命力总是短暂的——尽管也许现在看起来非常灿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新课程研究院（公益机构）院长，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调查

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学校

今年，上海市黄浦区对学生进行了大样本的学情调查，其中有一项主观问题为：请描述你喜欢的学校是怎样的？经过编码分析，得出了学生喜欢的学校所要具备的要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学生状态，包括成绩、休息睡眠、运动、成功感、作业少、独立自主、有趣、轻松和愉悦等；（2）环境，包括生理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物理环境；（3）教师，包括教师外表、教学能力、对学生态度、教育理念、教学行为、个人修养等；（4）课程与活动要素，包括课程、活动等。其中，参考点数值最高的10条分别为活动丰富、独立自主、同伴关系、作业少、绿化、轻松、学风校风、餐饮、干净整洁和设施等。其中涉及到活动丰富的数值最高，其次是学生状态中的独立自主。值得一提的是前十条中没有一条是特指教师的。这或许看出来，在学生喜欢的学校当中，整体来看，把学校环境和自我感受放在首位，然后才会思考对教师提出一定希望和要求。

从学生的年段差异看，高中学生着重于自身的感受，所以“独立自主”、“作业少”和“轻松”这三条与学生自身状态有关的条目分别排在1~3位上；除了看到活动丰富、学风校风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外，我们还看到了师生关系和教师公平公正也进入第九和第十条，这说明高中阶段学生向往好的师生关系，同时希望教师要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而初中阶段学生把同伴关系放在首位，这也印

证了初中阶段是学生青春发育时期，学生渴望有朋友和伙伴。同时初中生还对活动非常向往，把活动丰富和综合实践活动作为前十项内容之一。小学生把外在的环境绿化和干净整洁作为喜欢学校的前几项，与高中生不一样的是他们对教师的亲和力要求更高一些。

从学生的性别差异看，男生把希望“作业少”放在第一位重要的位置，占全部48条的比例为6.75%，紧接其后为“自由自主”，比例为6.70%，与其相关还有第八条“轻松”和第十条“愉悦”，可见男生更加重视自身在校的生活状态。而女生把“活动丰富”放在第一位，比例为6.56%，其次是“绿化”和“同伴关系”，仔细分析一下，女生更感性，她们更在乎外在环境的优劣和自身参与活动情况并以之作为对学生喜欢学校的重要指标。（唐军：《读懂学生——基于2600名学生描述语句的质性分析》，《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4期）

特别推荐

政府部门超强控制：制约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一个要害性问题

吴康宁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教育改革历程虽已长达30多年，但没有谁能准确预测这场改革究竟将于何时结束。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一是这场改革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才开始进入所谓“深水区”；二是这场改革至少将延续到本世纪20年代末，因为两年前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时段便截止到2020年；三是由于“深水区”改革的难度远非“浅水区”所可比

拟，因而即便到 2020 年，这场教育改革也未必就能结束。仅此而论，我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在世界教育改革史上也实属罕见。

我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如此旷日持久？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就笔者陋见，一个十分重要的制约因素便是政府部门过于强势。如果说在 30 多年前或 20 多年前，经费投入不足极大地制约着我国教育改革进程的话，那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其对教育的支撑，这一问题如今已得到极大缓解；而且，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及其对教育的更多支撑，教育经费投入也将越来越不是问题。而相比之下，教育管理体制的障碍却是 30 多年来一直严重制约我国教育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一个要害性制约因素，一个必须动真格解决的瓶颈性问题。而在教育管理体制障碍中，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超强控制便是其突出表征。

这里的一个吊诡性问题是：由于在政府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许多重要教育改革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官方教育改革”，而任何层面（国家、省、地市、县）上的官方教育改革都需要有顶层设计及官方资源的基本分配，且这种顶层设计及资源分配的职能非政府部门莫属，这就难免会使政府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任何教育改革最终都必须使学校中的教育活动发生积极变化，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即便是官方教育改革，也必须落实为学校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旨归的改革行动，因而，教育改革的“操作终端”并不在政府部门，而是在学校。这意味着，学校应当成为教育改革的主体。这，也就决定了面对作为教育改革主体的学校，政府部门又不宜太强势，不能干预太多、干扰太多。否则，教育改革将失去底层的活力。

然而，现实状况恰恰是，在政府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对学校而言处于不容置疑的超强地位，学校则处于弱势甚至极度弱势的地位，政府部门与学校之间基本上是一种指令与执行的关系，学校由于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办学自主权而很难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主体。

一、无所不能的角色：政府部门超强控制教育改革的主要表现

笔者五年前曾专门述及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政府对于教育改革的强控制问题，指出在一个国家中，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虽然既因政府自身的职能规定而异，也因教育改革的性质与规模而异，不宜一概而论，但大体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扮演的主要是“顶层设计者”的角色，即提出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总体架构，勾勒教育改革的蓝图，一般不会去细及教育改革所有方面，也不会深及教育改革所有过程；而在中国，政府赋予其自身在教育改革中的职能则要多得多，也大得多。政府通过其为数众多的职能部门，将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监督者、调控者及评价者等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对教育改革实行强控制。笔者并简述了这种强控制的三个基本特征：

(1) 全方位控制。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红头文件”，不仅勾勒教育改革的蓝图，而且提出教育改革的主要原则、基本路径及相关政策，有时甚至还规定教育改革的具体方式及条件保障等等。(2) 全过程控制。即政府不只是在教育改革开始前提出改革计划；而且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通过数据统计、实地考察、巡视检查等方式，对改革进行持续的实质性管理、监督及调控；并且在教育改革告一段落后通过总结与验收，对教育改革的结果进行评价。(3) 高强度控制。政府通过资源配置或资源重新配置等手段，不断示明教育改革的方向与重点，规限学校的改革行

教的路径与方式。笔者还指出，这三个基本特征的存在，使得教育改革具有较强的指令性与规范性特征，自上而下的色彩很浓，结果便在实际上存在着关于教育改革的诸多“官方标准”。而官方标准的存在，既容易导致“官方(主导的)教育改革”难免出现趋同化倾向，很难真正形成丰富多样、充满个性与张力的格局；也容易导致“民间教育改革”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使得民间教育改革不是我行我素，游离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流之外，便是最终以某种方式纳入官方认可的轨道，最终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官方教育改革”，或“半官方的教育改革”。

时至今日，笔者则进一步感到，在当下中国，所谓“政府控制”，通常情况下其实基本上都是“政府部门控制”。尽管迄今为止人们通常使用的表述都是“政府对学校的控制”，但就我国现状来看，一方面，政府的职能实际上都是由相关具体部门来履行的，政府所拥有的几乎所有重要办学资源实际上都分别掌控在相关具体部门手中；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部门的“利益群体”特性日趋明显，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凸显。其结果，学校所面对的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不如说常常是林林总总的“政府部门”。因此，至少就我国现状来看，所谓“政府对学校的控制”，在日常实践中通常体现为作为利益群体的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对学校的控制”。

与此同时，笔者也愈加感到，一般意义上的“强控制”概念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对教育改革的控制程度，而是有必要使用“超强控制”这一概念。这是因为，与上述三个基本特征相伴随的，是两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普遍现象。

一是“长官意志”。上面谈到，所谓“政府控制”，通常情况下其实基本上都

是“政府部门控制”。而若作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控制并不总是、甚至经常不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实施的，而是常常根据领导人的意愿来讲行的。这里所说的领导人可以是政府领导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领导人。大量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由于存在着“人治”的治理传统、“官本位”的决策取向以及领导人的“政绩”情结，由于领导人的更迭或领导人自身意图的改变，使得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控制一方面具有强劲的刚性，另一方面又充满了随意性与不确定性。事实上，这些年来许多教育改革项目的上马与下马、教育改革进程的加快与减缓，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或政府部门领导人的更迭或领导本人意图的改变有关。而在唯“长官意志”马首是瞻这一中国官场文化重要特征的影响下，这种随意性与不确定性不仅丝毫没有弱化政府部门对学校的刚性控制，反而强化了这种刚性控制，因为它导致学校不得不随时准备适应政府部门的新的刚性控制。

二是“官学共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政府教育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期待日益增强。迫于这方面的压力，政府或政府部门已很少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拍拍脑袋，便在一夜之间推出教育改革计划或改革举措，而是会在教育改革决策之前，通过民意调查、各界座谈、专家咨询等途径进行相关论证。这当中，最受政府部门“青睐”的往往是专家咨询，因为“专家咨询”可以为教育改革决策添加“科学性”色彩。平心而论，不少专家咨询意见对于教育改革决策或改革举措的科学性也确实有所贡献，但一个无法否认的日常事实是，随着急功近利、政绩至上的风气在中国官场中的日益蔓延，同时也随着“专家队伍”的犬儒主义特征日益明显，政府部门与专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也已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即：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名与利的吸引，将有关专家“收编”于听命调遣的“御用专家队伍”之中，让他们为政府部门拟订的各种各样的规划、计划、方案等等进行所谓的论证。之所以说是“所谓的论证”，是因为政府部门所期待的此类论证的基本性质通常只限于修补与完善，而不包括批判与推翻。另一方面，许多专家出于对名与利的追求，也乐于成为政府部门“御用”专家队伍中的一员，乐于为政府部门拟订的规划、计划、方案等等配置思想引领，寻找理论依据，推敲逻辑框架。即便有所微辞，通常也会把握分寸，适可而止，一般不会越过政府部门所能容忍的批评底线。如此一来，经过专家论证的这些规划、计划、方案等等，也就不仅挟以行政的力量，而且伴有理想的展示、科学的包装、形式的完善。于是，如今的政府部门通过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制订的各种各样的规划、计划、方案而对学校、对教育改革进行控制时也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而是同专家们“联手作战”了。在这个意义上，政府部门与专家便形成了一种“共谋”的关系。专家的“加盟”，使得政府对于学校及教育的控制变得更加“科学合理”，并因此而更加“强劲有力”。

二、不受限制的权力：政府部门超强控制教育改革的原因分析

政府部门之所以在教育改革中占有超强地位，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拥有权力。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赋予给了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太多、太大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赋予给了政府部门几无限制的权力。从对教育改革的制约来看，政府部门对于学校至少拥有三大权力：

一是校长任免权

校长作为学校的领路人，对于学校改革发展的目标设定、计划确定以及政策

制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在中国，(公立)学校校长的产生并不是由全校教师根据本校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需要进行民主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安排的产物。即是说，校长的任职最终并非取决于全校教师的信赖，而是取决于政府部门的信任，尽管政府部门的意中人也有可能是全校教师的心中人。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以撤免校长。而校长的撤免最终也非取决于全校教师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態度，尽管政府部门的態度未必总是和全校教师的意愿相左。

受这种学校领导配备制度的制约，校长便常常会陷入既要对学校负责，又不得不对政府部门负责的两难境地之中，尽管全校教师对校长的期盼与政府部门对校长的期待并非总是格格不入。校长如果不能得到全校教师的满意评价，便会失去领导的权威；而如果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满意评价，则迟早会失去领导的权位。当然，未必所有校长都会看重现有权位及由此而带来的名和利，然而，由于一旦失去权位，则连办好一所学校、实现自身教育理想的合法途径都没有，这就使得大部分校长对于政府部门的指令与需求都不会完全置之不理，而是会尽可能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

二是资源分配权

学校办学需要有资源保障。而在现行体制下，许多重要办学资源都掌控在政府部门手中。这些重要办学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人员编制、职称比例、高素质师资等)，财力资源(基本办学经费、各种支持经费等)，物的资源(土地、建筑、设施设备等)。“物”的资源虽然离不开“财”的资源，但物的问题常常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学校办学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的物的资源，常常须经

“政府审批”才能获取，如购置发展用地、建造校园校舍、购买设施设备等）。

政府部门控制学校办学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便是设立各种各样的“工程”与“项目”，要求学校申报，并由政府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实行行政审批。近2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政府部门可支配的办学资源也不断增加。与之相应，各级政府部门设立的工程与项目的种类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支持力度越来越强。而能否争取到这些工程或项目，不仅关系到学校的进一步发展能否获得更多、更好的外部支持条件，且其本身也已成为对学校的能力与地位进行评价的一种依据。因此，几乎所有学校对于申报政府部门设立的工程与项目都不敢怠慢，乃至趋之若鹜，哪怕明明知道有些工程与项目对于学校的内涵式发展与教育质量提高其实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这就导致出现了当今学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一道极具中国特色的“互动”景观——各级政府部门不断设立各种各样的工程与项目，不断布置学校申报，不断组织专家评审，不断进行行政审批，并对获准立项的学校不断进行检查、评估、验收；而学校则不断去申报，不断去争取，在获批之后按照工程与项目的要求不断组织实施，并不断迎接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与验收。

三是等级区分权

政府部门不光垄断了各种重要办学资源，而且还制造出各种不同的等级，包括各种各样的奖项、名分、荣誉等等，怂恿学校和教师去竞争。由于我们的政府机构十分庞大，部门林立，因而，由政府部门所设立的奖项、名分、荣誉等等也极其繁多，（有些奖项、名分、荣誉的颁布者虽然并非具体政府部门，而是“人民政府”，但其所有的策划与评选工作均由具体政府部门组织实施。）几乎涉及学

校工作可能涉及到的所有方面，诸如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研究成果奖，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道德模范、优秀党务工作者，精神文明示范学校，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等等，数不胜数。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部门来设立名目如此繁杂的奖项、名分和荣誉，对学校 and 教师进行如此繁多的等级区分。过多的分等(评选)活动很容易打乱学校的工作节奏，扰乱校长与教师的心态，并且因不正之风的存在而腐蚀教育的道德氛围。

如此，政府部门便通过任免校长、分配资源、制造等级，把学校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使得学校不得不经常围着政府部门设立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工程与项目的指挥棒转，很难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愿望去治理学校、改革教育。就此而论，在现行的政府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与其说是学校在办学与改革，不如说是政府部门在办学与改革。

可以说，正因为拥有上述种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使得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控制几乎没有什么顾忌，使得即便在“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的日益强烈的呼声中，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超强控制也不见有丝毫弱化。而在政府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学校面对政府部门的超强控制或者是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无奈服从；或者是即便言论上有所批评与建议，行动上却依然亦步亦趋地服从政府部门的指令；或者是表面上坚决贯彻落实政府部门的指示精神，实际上却大搞形式主义、敷衍应对；或者是把学校已经进行或计划进行的事项改头换面，包装与“整合”到政府部门所规划、组织的工程与项目之中。对于这些现象，用不着实证调查也可明了，因为这就是如今几乎所有学校工作者的日常经历和日常感受。

三、限制政府部门权力：有效推进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1. 限定政府部门职能

政府部门绝对不能再像迄今为止的那样，摆出全能型、万能型的架势，将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监督者、调控者、评价者等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对于政府部门在教育改革中的职能，必须加以严格限定。在笔者看来，政府部门所需履行的主要职能仅限于两种。

其一是“顶层设计”。政府部门的首要职责便是在进行充分的实际调查与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最终目标及总体架构，勾勒教育改革的蓝图。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对教育改革作出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便是政府部门最大的失责。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政府，并不仅限于中央政府，而是指各级政府（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对于自己所辖行政区域的教育改革，都负有顶层设计的职责，都必须担负起这个职责。

其二是“资源分配”。这里所说的资源指的是“官方资源”，也即由政府部门掌控的资源，包括人员编制、财政投入、发展用地以及政府（部门）设立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奖项、机会等。由于体制方面的国情差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中国，官方资源的作用十分强劲，计划经济的色彩极为浓厚，而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依然会存在，且鉴于迄今为止这些官方资源的分配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缺少科学依据、官员趁机寻租、使用效益低下等问题，因而，十分有必要对官方资源的分配总量、分配方式及效益评价进行认真反思，使官方资源对教育改革能够真正起到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与此同时，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必须逐步地、尽可能减少官方资源在办学资源总量中的比重，尤其是应制定必要的制度规范，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部门的权力，阻止其随心所欲地设立那些导致学

校盲目竞争、拼命竞争、恶性竞争的项目、奖项、机会等等。

2. 实行民主推选校长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领路人，但任何校长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便可将学校的教育工作与事业发展推向前进，而是必须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真正集中全校教职员工智慧。校长究竟能否把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他们的智慧真正集中起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便在于能否得到全校教职员工的拥护。

就此而论，校长的比较合理的产生方式应当是民主推选，而不是现在的组织委任。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教育改革向“深水区”的逐步推进，组织委任校长的弊端已经日益明显。其主要弊端如前已述，即因政府部门掌控校长任免大权而使校长们常常陷入既要对学校负责、同时又不得不对政府部门负责的两难境地之中，结果导致校长们解放思想、从本校实际出发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而民主推选校长则与之不同。全校教职员工可以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与实际状况，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校长的标准，在对校长候选人进行道德人格、义务水平、管理能力等诸方面综合比较与判断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选择。通过民主推选方式产生的校长，通常会首先对学校自身的教育改革和事业发展负责，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及全校教职员工的利益负责，而不是首先对政府部门的下达指标、制度规定以及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负责。这样的校长由于拥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在全校教职员工心目中、至少在大部分教职员工心目中具有威信，这就有利于校长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真正集中全校教职员工的智慧，比较

顺畅地推进教育改革过程。

当然，在有些学校，即便采取民主推选的方式，也推选不出为大多数教职员工所认可的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可以采取上级部门从校外委任校长的方式。但这种组织委任的方式应该是对于民主推选方式的一种补充，而不应成为主要方式。

3. 大力扶持民间力量

教育改革最强大、最根本的动力在民间。即便由政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官方教育改革，若是没有民间的充分认同、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也不可能顺畅推进，更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历程已经反反复复表明的一個基本事实。大力扶持民间力量，让民间力量更多地从教育改革的后台走到前台，从教育改革的边缘走到中央，这才是中国教育改革获得强大生命力、实现可持续推进、并最终获得名副其实的成功之希望所在。这里所说的民间力量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民间智库。应大力促进民间智库的形成、建设及功能发挥。鼓励民间智库对教育改革进行自由的独立研究，提供客观可靠的研究报告。使民间智库研究报告成为政府寻觅教育决策科学依据的主要来源。

民间评鉴机构。除极特殊情况外，政府部门不应直接组织对于教育改革效果的评估、检查、验收等，而是应全权委托第三方评鉴机构组织实施。这种第三方评鉴机构应当是民间的、独立的，它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也独立于评估对象，以保证评鉴结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民间联盟。应允许不同学校组成民间联盟。这种民间的学校联盟应当既具有

较强的专业特征，对教育改革中具普遍意义的技术性问题进行自发的联合攻关；也应当具有较强的价值色彩，联合倡导和实行符合教育规律、有利于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成长的改革措施，联合反对和抵制违背教育规律、妨碍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的制度规范、政策措施及行政指令。使这样的民间联盟成为对政府的教育决策和管理行为具有积极意义的“压力群体”。

民间舆论。对于教育改革实际状况与实际效果的最真实的反映永远在民间，民间舆论是政府掌握教育改革实情、制定与调整改革决策的至关重要的依据。应当进一步开放舆论政策，支持媒体真实反映关于教育改革的民间舆论。尤其是有必要改变官方教育媒体基本上只是报道与宣传教育改革成绩的传统面孔，将真实反映存在问题、真实呈现民间舆论和积极引导舆论方向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官方教育媒体关于教育改革的报道与主张真正具有可信度与有效性，使得民间舆论能够成为促进教育改革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

读书

书名：《构建教育新模式》

作者：张卓玉

推荐理由：作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作者近十年来一直在大力倡导课堂教学改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书是继《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否可能》后作者的又一力作。书从学习小组谈起，指出正是这种不起眼的变化，开启了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进而引



发了一系列制度重建。在朴实的书名之下，是平实流畅的文字，读起来仿佛与一位长者娓娓清谈，沁人心脾。

书摘

论公共精神的培养

公共精神的存在前提和存在价值是公共社会。公共社会指公众共有共享的社会。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属于公共社会的范畴。有学者把公共社会分为 18 个大的领域，包括公共所有，公共经济，公共财政，公共设施，公共产品，公共政策，公共权力，公共权利，公共程序，公共人物，公共领域，公共事务，公共项目，公共管理，公共心理，公共节目，公共资源，公共机制。

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教育既存在于公共社会，又服务于公共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许多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还是社会的前奏？
- 学校更应该传承家庭价值准则，还是更应该培养社会价值准则？
- 教育更关注个人成就，还是更关注社会进步，还是寻找二者的结合点？
- 个人成功是否就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
- 有私德就一定有公德吗？
- 能齐家者就一定治国吗？

基础教育的本质特征在“基础”二字。何为基础？我的理解，所谓基础，应该包括人的成长基础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公共精神就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一种好

的教育，一所好的学校，应该以同样的态度关注两种基础。

每一个人都兼有两种身份：职业领域中的身份，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身份。前者体现着他的兴趣爱好，学识能力，个人成就。比如，教师，经理，职员，作家。后者体现着他在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和权利。比如，在政治生活中，不论是什么职业的人，都是公民。在音乐厅，大家的共同身份是听众。在餐厅，你我他都是就餐者。面对文化遗产，面对地球的不可再生资源，人人都是享有者和保护者。面对自由、民主、正义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人人都是捍卫者。这就是公共生活中人们的共同身份。

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身份。如果把“公民”这个词理解为公共生活中的成员，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习惯上，人们把“公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使用。为了表述方便，我在广义上使用公民这个词：公共生活中的成员。这样的理解显然超越了政治领域。

如果这样理解公民，以上的讨论就适用于学生了。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学校这个社会的公民。

公共精神的培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今天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老话题迎来了新时机。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需要公共精神、催生公共精神的公共社会、公共生活正在形成。城镇化挑战着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村落文化，挑战着每一个走进城镇的新市民。即使在乡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市场经济的本质，一方面是人或企业的自主自治，另一方面是人或企业的互通互联。它们所依存的价值基础就是公共精神。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匹配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意味着人们将从臣民走向公民，从他人

已经设计好、安排好的臣民社会走向需要每个人参与、建设、担当的公民社会。在我国，以上诸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一种有着相同文化追求的新技术奇迹般地同时出现，这就是信息技术。互通互联，参与互动，共建共享等，构成了信息技术的主要特点。信息技术文化所需要的，所催生的，也是公共精神。

我很喜欢一种形象的表述：时代的移民，时代的土著。今天的家长辈、教师辈的人，基本上是上述新时代的移民。尽管我们都参与了这场社会变革，但是，我们总是在努力适应着新时代。我们是新时代的移民，而今天的在校学生，则是生在新时代、长在新时代的土著。这些土著们在进入移民们开办的学校之前，在就读于移民们所管理的学校的同时，已经和正在上着另一所学校，这就是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我每次和学生交流，都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气息。他们的谈吐，他们的价值，他们的才能和潜质，常常让我想起四个字：后生可畏。很难说这是学校教育使然，也很难说这一代人一定比上一代人天生聪明。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新时代的土著们与生俱有的特质。我认为，推进教育转型的最重要力量，或者说，新教育的真正土壤，是今天或明天的学生。就公共精神培养而言，与其说这是学校想给予学生的教育，不如说是学生们要求学校提供的教育。

日前看到一篇中国记者采访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现任主任的报道。记者问：哈佛大学招收学生的标准是什么？这位主任回答：能够让身边的人变得更好的人，就是我想要的人。这个标准非常具体、形象地概括了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期待，也非常准确地诠释了公共精神的内涵。

如需订阅，请发送个人邮箱信息至中国新课程研究院
邮箱：xkcyjy82097172@126.com。